

“二十世纪初叶的敦煌写本伪卷” 学术研讨会简介

荣新江

1997年 6月 30日至 7月 2日,设在英国图书馆(The British Library)的“国际敦煌学计划”(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成功地举办了一次小规模的敦煌学术研讨会,题目是“二十世纪初叶的敦煌写本伪卷”(Forgeries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这次会议缘起于日本学者藤枝晃教授的如下看法:他在研究大谷探险队 1912年所获敦煌写本时,认为其中含有伪卷,并进而认为除了斯坦因(1907年)、伯希和(1908年)和北京政府(1910年)所得敦煌写卷外,其他如大谷队、俄国奥登堡探险队(1914—1915年)、斯坦因第三次探险队(1915年)所得敦煌写卷中,均有伪卷。英国图书馆的敦煌藏卷向以来最多最好而,夸耀于世,这样一来就有约六百卷值得怀疑。为此,英图邀请世界各地的敦煌学者、研究纸张的科学工作者和各大馆藏的保管人员,汇聚英伦,各抒己见,以探讨各国所藏敦煌写卷和绘画中的真品和伪物。

会期三天,各有主题。以下按发表论文的顺序,简要介绍一些文章的内容和相关讨论情况。

6月 30日第一场的主题是“相关背景”。

主持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兰卡斯(Lewis Lancaster)教授致开幕词,他讲了这次会议的缘起和有关的主要看法,特别表彰了藤枝晃先生在敦煌写本的古文书学研究方面的贡献。

中国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的论文题目是《李盛铎藏卷的真与伪》(The Li Shengduo collection: original or forged manuscripts?),主要论证了李盛铎是从学部直接拿到的卷子,故而他家有最好一批写本。1935年这批真卷售诸日本,迄今不知所在。但其目录稿本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可知其原藏真卷情形。大概在 1937年李氏死后,开始有所谓李氏造伪卷的出现,但这其实是李之外甥陈某所造。坊间流传的李氏藏卷,多非李家原物,但是真是伪,需个案考察。

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藤枝晃先生以八十七岁高龄到会,他发表的论文是《敦煌真本特征图示引言》(Introduction to chart showing characteristics of genuine manuscripts),

用其本人所摄清晰的图版,来说明敦煌吐鲁番早期写本字体的年代特征。他特别强调专家应当自己摄制照片,否则会影响研究的结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方广昌先生讲题为《鉴别敦煌写本中的三个问题》(Three questions in the appraisal of Dunhuang manuscripts),主要谈藏经洞文献和敦煌文献的概念确定及混入藏经洞的其他文献,举北图藏卷为例。

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EPHE)历史语言部戴仁(Jean-pierre Drège)教授的题目是《敦煌伪卷随记》(Random notes on Dunhuang forgeries)。戴仁教授是敦煌写本内容和外观分析的双科专家,他认为巴黎、伦敦、圣彼得堡三大收集品应是真卷,而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敦煌卷子颇值得怀疑,伯希和三十年代购自北京的板画及索写本《老子道德经》应是赝品。他还归纳了各种鉴别伪卷的方法。惜发言时间有限,未能深论。

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主任科恩(Monique Cohen)夫人的《真品还是赝品?》(Genuine or Fake?),强调鉴别伪卷时要首先注意其来历,来历不明,则需分析内容、形态、关联等方面。她特别谈到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叶昌炽原藏《地藏菩萨像》,对此图有所怀疑。但敦煌画专家韦陀(F. Whitfield)教授表示此画不会是假的。

中国北京图书馆杜伟生先生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赝本八种概述》(A short description of eight Dunhuang forgerie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对《敦煌劫余录》所收八种赝本一一作了考察,用真本对比,指出其作伪的痕迹。这些写本应是1910-1931年间混入北图藏品的,与藏经洞文书有别。

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的魏普贤(Helene Vetch)女士的《写本和印本史料间的差异问题》(Discrepancies between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sources),以S. 2925 P. 3608和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一件写本为例,来说明造成两者差异的原因。

7月1日第二场的主题是“科学、纸张、书法”。

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的Ken Seddon教授和John Fields合作的《部分敦煌写卷标本所用染料的化学分析》(Chemical analysis of dyes on a selection of Dunhuang manuscripts),是用液体副离子质量的光谱分析方法(the technique of liquid secondary ion mass spectrometry)来测试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得敦煌写卷标本的初步分析及研究展望。他们所用作标本的几个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获写经裁下的纸片,有一个接近于近代日本纸。

日本京都大学河野益近博士和龙谷大学江南和幸教授等人合作的《大谷收集品中古代写本的物理学分析》(Physical analysis of ancient manuscripts of the Otani collections),用物理方法分析纸和墨中所含的金属成份,对比出吐鲁番写本和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年)、中国清代纸的不同,希图以此为判断写本真伪的一个标尺。

藤枝晃《纸卷的裁边和划栏工具的发现》(Excavation of rulers for marking the edges and marginal lines of scrolls),介绍了日本考古发现的古尺的上述用途,并继续谈了制作记录纸质的照片时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丹麦国立博物馆Anna-Grethe Rischel的报告《伪物还是真品:能否用对纸的结构与纤维组织的研究来回答这一问题》(Forgery or genuine? Can studies of paper structure and fibre condition shed light on this problem?),考察了瑞典国立人种学博物馆所藏68

件斯文赫定所获中亚写本。她用显微照片所反映的纸纤维网状和链状的不同,认为前者具多则为古代写本,否则为近代制品。

龙谷大学上山大峻教授的《我是如何来确信大谷收集品中含有伪卷的》(How I came to be convinced that the Otani Collection contains forged manuscripts),据现藏北图的原大谷探险队所获《瑜伽师地论分门记》一真题记笔体之不同,认为有两件可能是伪物。

日本北海道大学石塚晴通教授的《从汉字标本和书写材料看敦煌伪卷》(Forgeries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from the point of the standard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writing materials),声称“斯坦因第二次探险队和伯希和探险队之后各国探险队所买的写本一多半(约 80%)是假的”!并对比一些写本字体的演变和书写材料如纸笔的变化,确指斯坦因第三次探险所获卷子 S 6383 6688 6830 6957 6577 6568 6536 6580 6476等为伪卷,其理由是纸张不同,字体差异和铅笔划栏等。英国图书馆把相关的写卷从库房拿到会场,便于更多的专家仔细观察,一些与会者表示很难认同石塚氏的看法。

京都国立博物馆的 Eikei Akao 氏的论文是《关于敦煌写本所见纸的形态及每叶纸行数的变化》(On the changes in the type of paper used and the number of lines per panel as seen in Dunhuang manuscripts),用 35 件斯坦因卷子作统计分析。但戴仁教授指出,他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做过同样的工作。

7月 2 日的主题是“其他特征,其他收集品,集体讨论。”

瑞士洛桑大学 Cristina Scherrer-Schaub 博士的《古藏文写本类型学的建构:一个综合探讨》(Establishing a typology of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主要利用西藏(阿里附近)Tabo(Spiti)发现的古藏文佛教文献,与敦煌写本对比,来确定古藏文写本的各种类型。

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的 Nadia Brovenko 博士的《别列佐夫斯基收集品中的“西蕃”写本》(The Hsi-fan manuscript from Berezovskiy's collection),介绍了收藏于该所的这批库车出土文书,主要是胡语文献,特别就其中的 SJ B-72 号所谓“西蕃”写本的来源和真伪作了详细考察。

同所的孟列夫(Lev Menshikov)教授的《俄藏敦煌收集品中的伪物问题》(On the forgeries in Russian Dunhuang collections),明确地说俄藏卷中没有伪物,而日本学者金冈照光等把小说当作史实,故有俄藏卷中有伪的说法。他还临时对此次会议的主题做了评说,对藤枝氏的伪本说提出不同看法。但许多人不明白为何在清朝政府拿走所余写卷后,奥登堡还能有如此多的收获。荣新江简要谈了斯坦因来前和清政府取后藏经洞写本流散的情况,并举斯坦因、伯希和、叶昌炽、端方等人获得卷子的例子,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韦陀教授认为奥登堡可能是从洪辩座下的洞中发现写本的。

台湾中正大学中文系郑阿财教授的《台湾的敦煌写本收藏及研究情况概述》(A survey o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collections and research in Taiwan),除了详述中央图书馆和台北历史博物馆藏卷的来源与现状外,还报道了故宫的新收集品和史语所新清理出敦煌写本的消息。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韦陀(Roderick Whitfield)教授《伪本与敦煌绘画》(Forgeries and Dunhuang Paintings)是压轴戏,他详细对比了弗利尔藏地藏藏画像和英法藏真品敦煌

绘画的共同特征,确定其为真迹无疑。又指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等地所藏所谓隋代纸画的伪迹,详细分析了台北故宫藏张大千所赠两幅隋画是如何按莫高窟壁画作伪的。其讲演图文并茂,极具说服力。

会议由 Seddon教授做了总结。Lancaster教授主持了展望性的讨论,主要是围绕英图的建立国际敦煌资料 Database 计划,此计划希望把全世界的敦煌原卷和研究文献目录都输入电脑,以供敦煌学者之需要。

会议论文将结集出版,列为 The British Library Studies in Conservation Science 丛书第 III 种。会后,由韦陀教授主持,藤枝晃、兰卡斯、荣新江三位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做了一次公开讲演,综合报道本次会议的讨论情况以及各自的不同看法。

笔者参加本次敦煌伪本研讨会,颇有一些感受。简单说来,藤枝晃教授积多年来从古文书学的角度研究敦煌写本的经验,提醒我们重视伪本的存在。特别是在目前,当英图、法图、北图等直接来自藏经洞的文献公布以后,正在陆续公布许多小收集品。这些小收集品中真伪混杂,我们应当十分警惕其中的伪卷,以免把研究建立在完全不可靠的基石上,同时也不能把真本简单地叱为伪卷,使真贵的史料化为乌有。鉴别真伪是一件极为不易的工作,敦煌藏经洞保存下来的写本,来源十分复杂,目前我们所拥有的古文书学研究成果,尚不能反映敦煌文书的多样性,也不能提供判断伪卷的全部真品标本。古代敦煌原本就应有唐朝两京及南北各地的纸张,所以有些或许与近代日本纸的原料相当。因此,科学的检测应当与对文本内容、来源的分析结果结合起来,而不能只根据某一方面的考查结果,就匆匆得出是真是伪的结论。笔者在会上会下的交流中,获得许多科学和古文书学方面的知识,但同时也感到,大多数与会者对于清末民初敦煌当地的历史背景以及敦煌写本在中国官僚士大夫间早期流传的掌故知之甚少。敦煌真伪写本问题,是每一位敦煌研究者都要面临的棘手的问题;敦煌真伪写本问题的解决,也有待于敦煌写本研究者、对纸墨染料进行科学分析的科学工作者、古文书学者、书画鉴定专家、清末民初西北及西域探险史研究者、图书馆员、敦煌写本收藏家的通盘合作,用个案处理的方式,一一考查各收集品的真伪情况。从这一意义上讲,伦敦的敦煌伪本研讨会,在这一领域里开了一个好头。

· 简 讯 ·

《敦煌音义汇考》问世

杭州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张金泉、许建平所著《敦煌音义汇考》一书,已于 1996 年 12 月由杭州大学出版社手写影印出版。敦煌音韵学的研究是敦煌学研究中开展时代较早、且成果较为丰富的领域之一,王国维、罗常培、姜亮夫、周祖谟、邵荣芬等都作出过重大贡献。但是,过去的研究多注重韵书残卷、蕃汉对音及少量假借字的研究,而未注意佛经、儒典及其它文书中的音义材料。《敦煌音义汇考》则广泛辑较此类内容,详加考校,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份珍贵的音韵学资料,而且也为汉语音韵史的研究贡献了至为厚重的成果。

(白 牛)